



一名勇敢的 经验主义者的崛起

Simon Willson 对比阿特丽斯·威德·迪毛罗的采访

德国政府的Sachverständigenrat（即经济专家委员会）在成立的头41年中素有“五贤男”之美称。如果说这一称号是为了婉转邀请该国女性经济学家加入这一长期全部都由男性把持的团队，那么可以说这一局面维持了长达40个年头。比阿特丽斯·威德·迪毛罗（Beatrice Weder di Mauro）于2004年6月得到任命，成为该团队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威德·迪毛罗说：“我的朋友建议把委员会的称呼改为五贤人”。

威德·迪毛罗的到来不仅扫除了性别壁垒，跻身于德国政府和议会的经济智囊团。出生于瑞士巴塞尔的威德·迪毛罗也是委员会中第一位非本国成员，此外，38岁的她还是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个。在开创了这么多项先例后，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最知名的经济学家。

今天，五贤人组合正引领着重大宏观经济改革，目的就是欧元区变成世界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由于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公众中的评价高于诸如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等其他同类机构，因此威德·迪毛罗在公众的殷切关注中开始了其任期。但随后委员会几经调查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激进的财政改革

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建议，这一光环也很快随之黯然失色。但威德·迪毛罗给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带来了专家政治的名声，并成为该团队重量级的人物。

威德·迪毛罗以她直截了当和坚持不懈的调研精神著称，并因最先研究银行在金融危机传播中的作用而进入德国议会的视线。值得一提的是，她还调查过腐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而且言辞犀利，在那一时期，腐败往往被委婉地称作“治理”。她也让德国议会清楚地知道该如何最有效地散布研究结果和发现。对于一个多少都需要依靠媒体宣布新发现和指导建议的独立议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委员会轶事

威德·迪毛罗的早期研究采用的是综合方法，与研究对象的规模无关。世界银行公共部门的高级专家格雷戈里·基苏尼科先生曾于1996—1997年间与威德·迪毛罗共事，在世界范围内调查政局动荡、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在回忆录中刻画了一个执著、专注的经验主义者的形象，从不因“没有数据”之类的

琐碎标注而退缩。

基苏尼科回忆到：“这在制度不确定性的研究中是第一次大量收集原始数据，她竭力扩大国家的覆盖面，尽可能地收纳更多国家。收集数据的工作非常巨大，需要群策群力，跨度多达70余个国家”。她的同事也说：“她新奇而大气的想法令人兴奋并为之鼓舞。我们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她却总能脱颖而出”。

不可思议的是，威德·迪毛罗在此之前已在其他欧洲主要经济体中担任过类似德国经济顾问的职位。她曾于2002年被任命为瑞士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是什么让她对国家经济顾问这项工作抱有如此大的热情而且接连两次都是做相同的工作呢？威德·迪毛罗的答案是，“能够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的同时还能从事学术研究，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当然，有时这并不容易，因为与决策相关的课题可能比较枯燥，相反，有趣的研究也可能与政策制定无关”。

但威德·迪毛罗强调说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众不同，这是一个独立的团体（见专栏1）。虽然委员会成员由政府任命，但成员的任期却是5年，有意与4年一次的选举周期错开。威德·迪毛罗认为该委员会有两种施加影响的渠道。一条是公众渠道——一旦出现新的经济进展，委员会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另外一条则是政府的内部渠道。威德·迪毛罗发现，“人们经常问我是否认为我们的建议得到了正确执行，在我看来这就是委员会发挥影响的途径之一。通常，这比我们在某一方面的长期影响意义更大”。

然而，经济界却认为委员会的影响力有限，而且这一观点已流行多年。查理斯·罗伯特在1979年的《剑桥经济学》杂志中写道：

“由于委员会的报告只有德语版，所以他们在非德语国家或地区的知名度很小，几乎不被提及”——这一情况迄今没有改善。威德·迪毛罗则认为报告已有英文摘要，而且该报告之所以以德语为主是因为该报告的受众是德国政府和公众。

对手、自我、纷争

2005年，委员会与媒体的紧密联系被曝光。该年，德国媒体相继绘声绘色地披露了，在委员会这一全新、自信的阵容背后隐藏的种种脆弱以及委员会成员间的激烈纷争。委员会成员甚至在报纸上和采访中相互抨击，使得外界质疑他们能否够彼此合作。《经济学家》杂志认为德国的经济学家市场将分裂，建议由每届政府指定经济顾问重新组合委员会而不再采

用固定任期，这样顾问就有更多机会亲眼看到自己的建议得以实施。这场潜在的公共关系危机最终得以化解，委员会也维护了自己的形象。

威德·迪毛罗称，“委员会在德国的声誉极高，虽然人们的确也怀疑政客是否会听我们的，而且我们也经常让政府不太舒服，但他们无法完全绕开我们。委员会经常给政府挑刺，而其他国家的委员会是不会这样做的。哪一个政府愿意组建这样一个机构呢？”

那么到底哪一个政府会这样做呢？对于预算赤字高于欧盟规定的政府——就像德国2002—2006年的情况那样，这尤其困难。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并且失业率攀升，德国财政状况开始恶化，并让德国带上了令人不快的“欧洲病夫”的帽子。尤其是21世纪初，德国政府由于违背了欧盟规定的预算标准着实饱受国内传统主义者的诘难，因为欧盟的标准就是在德国清廉预算的基础上设定的——该标准已于1967年写入欧盟的标志性文件《稳定与增长公约》。欧盟在1992年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对成员国的财政情况做出了若干核心规定，这些规定在2005年有所放松。

威德·迪毛罗认为，“德国政府经常利用现有规则的漏洞打擦边球”。委员会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就如何改革宪法整体框架以限制德国的公债规模提出了建议”。她认为由于给予财政约束的关注不够，而且不严格按照这一约束办事，导致德国无法控制赤字，而且这一赤字已超出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但目前德国面临着一次财政改革的机会，联邦

专栏1

德国经济专家顾问委员会成立于1963年，该机构的宗旨中写道其使命就是，“为了定期评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综合经济进展，并帮助各级政策制定者和大众对经济事件做出理智判断”。

根据规定，委员会每年要出据一份报告阐述，“当前经济形势并预测发展前景。委员会需要研究能否同时达到多项目标，包括自由的市场经济、价格水平的稳定、高就业率、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保证经济适当、平稳的增长。该调查还包括收入和财产的形成和分配”。

2007年11月出版的名为“劳动成果不容浪费”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委员会称德国的政策制定者通过税收、劳动力市场和社保体系等一系列多领域的改革推动了经济复苏。

该报告还指出积极的经济走势同样也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我们应当抓住增加了的机遇采取政策行动，而不应任其流失……虽说政策制定者有了更大的可操作的财政空间，但令人沮丧的是，最近已采用或准备采用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经济政策线路，而更多的却是竞选伎俩”。

考察团正在审查联邦政府和各州的财政约束规则”。

瑞士制造

委员会报告强烈建议严格执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初的规定，国家的预算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除商业周期外不得有大的波动。如果说委员会的建议中有什么体现了外国因素的话，那就是从建议中能看出一些瑞士最先使用过的财政措施的影子。

威德·迪毛罗解释：“我们的建议多少借鉴了瑞士的经验：这样的组合比《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更加严格。瑞士的经验是建立一个专门的财政纠错账户并让其保持平衡。如果预算赤字比预期的要大，就记入账户的借方，逐一轧平；意料之外的财政盈余也得入账。瑞士于2003年开始实施该措施”。这一机制给财政体系植入了“记忆”。“我所知道的财政规则中没有一个是带有记忆的。人们经常会说，即使由于你高估了过去的财政收入而导致赤字比预期的要高，你也没有必要马上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就连《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不会这样做。这样，这些规则就形成了‘明天再开始减肥’的行为方式”，威德·迪毛罗如是说，“但一旦有了纠错账户，你就不能再事不关己了，必须得弥补过去的损失。系统的记忆会鼓励人们保守地估计财政收入，并在开支上精打细算”。

那么，德国的传统主义者是否能够接受来自外国的而且又更为严格的财政约束原则呢？或许会说七种语言、瑞士出生的威德·迪毛罗也被视作5人组合中的一个异类，鼓吹用外国方式解决德国的问题？威德·迪毛罗则称：“我瑞士人和意大利人的身份没给我造成过任何障碍”。

尽管威德·迪毛罗后期由于职业原因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并越来越关注财政问题，但她所受的教育使她很早就对增长和发展等宏观经济产生了兴趣。她在危地马拉长大，其父亲在那里的一家瑞士跨国公司工作。威德·迪毛罗在危地马拉的一家德国学校就读了9年，那段日子的生活可能影响了她日后的职业选择。她对拉丁美洲的接触让她对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生了兴趣。

“我对制度和制度差异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我在危地马拉的经历，后来与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自由与民主研究所有一个研究项目（见《金融与发展》2003年12月号），让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该项目调查了拉丁美洲的小型企业面临的困难，发现许多国家都没能落实执行其规章制度，这就制约了企业和交易的规模。在融资方面尤为明显，大量非正规融资因此蓬勃发展”。

银行的作用

回到瑞士后，威德·迪毛罗在巴塞尔大学完成了其学业，而且还当上了那所大学的研究与教学助理。她开玩笑地说：“过去，在我的兴趣和研究中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如何让制度发挥作用以促进增长；另一个就是金融风险的扩散途径，尤其是银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现在，我关注的问题又多了一个：那就是当我成为德国委员会的成员后，我要重新重视与德国联系相对紧密的各种问题，让我的研究和工作总结在一起”。她近期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不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中，实际汇率的变动对工作流动的影响；二是公共领域的银行在资金的再次分配中发挥的作用。

正是第二方面的兴趣让她于1994年在IMF的华盛顿总部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IMF工作期间，她曾离开过一阵子到世界银行参与《1997世界发展报告》的编写。威德·迪毛罗回忆到：“我们观察企业，问它们在经营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在此基础上我们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她说，调查（参与调查的还有Aymo

专栏2

另一条传染途径

威德·迪毛罗和Caroline Van Rijckeghem在2001年的《国际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意义重大的文章，她们指出与同一家银行有着往来关系的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间接的危机传播渠道。她们发现由银行借贷引发的外溢现象，在特定的贸易联系和国家特性等环境下，可能有助于解释危机扩散。

如果某些银行有着相同的风险模式，那么在一个国家爆发危机时可能由于这些银行同时削减信贷额度而传导至另一个国家。威德·迪毛罗的发现可能让她同其他批评家一样对新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持否定态度，而这一新的框架目前正在大约100个国家中实施。

这一新的框架——即巴塞尔II，在1988年瑞士巴塞尔清算银行出台的巴塞尔I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广受银行监管者的青睐。该框架为银行需持有的准备金数量制定了一条全球性准绳，目的是让银行更好地应对在融资和各项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批评家认为巴塞尔II具有顺周期性——在繁荣期对银行资本准备金的要求过于宽松，而在萧条期又过于严格，这加剧了盛衰期的波动。他们声称巴塞尔II会使银行同时进入或退出市场，这将最终带来系统性风险（见《金融与发展》2008年6月号的相关文章）。

Brunetti和Kisunko) 结果一出来就被纳入主流研究范畴,而且越来越多的改良方法也都被用来解释制度问题。

“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威德·迪毛罗在华盛顿关于制度和治理的研究引出了一个棘手而敏感的话题:腐败。她在一篇与哈佛大学的阿尔贝托·阿勒斯娜合作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腐败政府获得的国外援助真的就少吗”?

她回忆说:“我们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有证据表明过去在分配援助时也把受援国的腐败程度考虑进去吗?’当时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没有’。从那以后,腐败普遍被视作增长的障碍,因此发展体系应该对腐败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阿勒斯娜说这个项目反映了威德·迪毛罗典型的研究风格。“她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创造性地看待那些重要、相关但并不深奥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能提出新颖的观点。当大家在讨论援助是已经达到目的还是被浪费时,这个问题就被放上面,等待解决”。阿勒斯娜认为威德·迪毛罗的这种能力与德国专家委员会相得益彰:“她总能先发制人”。

在研究治理问题时,威德·迪毛罗在东京的联合国大学做了两年的客座研究员。1997—1998她在日本逗留期间正赶上亚洲金融危机,这又激发了她对一个新领域的兴趣:银行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她早期对治理和援助的研究使她自然而然地敢于挑战传统智慧。

重大金融危机一旦发生,最先提出也是反复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没能事先预见?”威德·迪毛罗清楚地记得,这些问题曾在1998年困惑着东京,而在今天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又听到了相同的声音。

10年前在东京,“人们把矛头直指贸易和第三市场效应,认为两者都是引发危机的祸首。但我当时对这一说法不敢苟同,因此我们开始探寻危机是如何通过金融系统进行传播的。那个时候,在亚洲许多爆发危机的国家中银行都是主要的资金提供者,而且根据过去种种迹象,一个国家遭受损失可能引起另一个国家削减信贷规模,这样银行就可能成为危机的传导渠道。”

威德·迪毛罗认为有必要对巴塞尔II进行仔细修改(专栏2)。“如果巴塞尔II中的风险管理体系周期性地对价格、利率和汇率做出反应,那么理论上就会加剧顺周期效应。但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完全是经验性的:到底是资本管制还是银行的经济资本才是硬性约束?如果对资本金的管制是硬性的,那么这会对贷款产生多大影响?”

从日本回来后,威德·迪毛罗于2001年当上了德国

美茵茨大学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教授,这为她当前的职位打下了基础。2007年,她参与了一个项目,模拟德国银行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贷款时将受巴塞尔II怎样的影响。她发现这一影响可能微不足道,因为银行似乎就是根据经济资本来分配贷款的。

双向教学

威德·迪毛罗第一次受任于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是作为阿克塞尔·韦伯的替补,韦伯被调到德国联邦银行担任行长,威德·迪毛罗则进入委员会完成其任期。由于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并妥善应对公众的关注,她再次得到任命,在委员会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5年任期。媒体耀眼的闪光灯并没给她造成太大的烦扰,因为她了解记者的工作模式。在巴塞尔大学担任助理时,她曾和一些同事给学新闻的学生教授基础经济学课程。这是一种双向教学:未来的记者们知道了什么是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滞涨,同时威德·迪毛罗及其同事也了解了头版头条、截稿日期、署名文章和不署名文章的运作——以及如何向公众解释复杂的经济内涵。

为学新闻的学生设计经济学课程是否意味着她看到了这一第四等级群体在经济学知识方面的严重不足?她说:“不应只向学新闻的学生传授经济学知识,每个人都应该用上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而且这也是像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应当发挥的作用之一。如果人们充耳不闻,那这是我们的错而不是他们的错”。

Simon Willson, 《金融与发展》高级编辑

参考文献:

Roberts, Charles C., 1979,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Making in West Germany: The Role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Expert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 pp. 83–89.

Weder di Mauro, Beatrice, and Alberto Alesina, 2002, “Do Corrupt Governments Receive Less Foreign Ai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pp. 1126–37.

Weder di Mauro, Beatrice, Aymo Brunetti, and Gregory Kisunko, 1998, “Credibility of Rule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a Worldwide Survey of the Private Sector,”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2, pp. 353–84.

Weder di Mauro, Beatrice, Thilo Liebig, Daniel Porath, and Michael Wedow, 2007, “Effects of Basel II on German Bank Lending to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Vol. 31, pp. 401–18.

Weder di Mauro, Beatrice, and Caroline Van Rijckeghem, 2001, “Sources of Contagion: Is It Finance or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4, pp. 293–308.

———, 2003, “Spillovers through Banking Centers: A Panel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 22, pp. 483–509.